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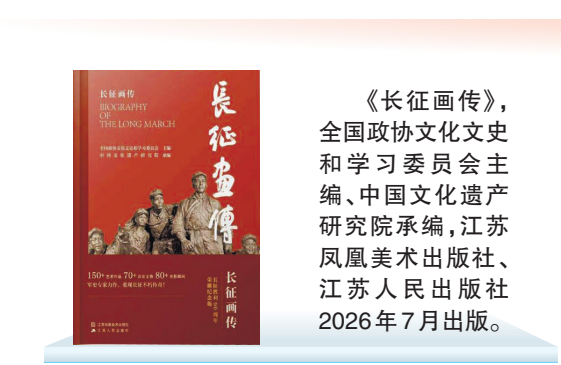


1996年,《红军长征史》一书首次出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题写书名,多位党政军领导同志题词。郭德宏和张树军同志担任主编,多位专家参加编写和审定。2016年将建农同志作了修订。该书自出版以来广受欢迎,多次重印,荣获国家图书奖和“五个一工程”奖,是记述红军长征历史的经典著作。2025年4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在完整保留2016年版内容基础上,对封面和装帧作了全新设计,出版了典藏特装版,营造出一种庄严肃穆的仪式感。通过学习,我觉得可以用四个“统一”来概括这部书的叙史特色。

一、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本书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参加编写、统改和审定的同志为党史、军史研究单位的专家学者。因此,在人员组成方面,这部书拥有“国家队”阵容。从内容上看,这部书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党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历史决议为写作依据,确保本书的政治导向、主旨思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讲党性,就要做到为党立言,讲清楚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苦难辉煌,讲明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胜利启示我们:党的领导是党和人民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这部书在分析长征胜利的原因时,第一条便落脚在党的领导下,即“及时地撤换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中央领导。”从头到尾读下来,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中央领导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在同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斗争中确立的,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这部书指出,在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从组织上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和政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不仅是 中国革命史上的壮丽史诗,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震撼人心的精神远征,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以鲜血与信仰铸就的不朽丰碑。长征精神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历经岁月洗礼而愈发熠熠生辉,持续激励着新时代的中华儿女奋勇前行。《长征画传》以严谨而深情的笔触,系统而生动地再现了长征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通过其中收录的珍贵历史影像与感人至深的纪实叙述,读者得以深刻体悟“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伟力,并从中汲取不畏艰难、敢于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红军长征胜利90年来,关于长征的书写与呈现始终在进行。从亲历者的口述回忆到专业史家的学术著述,从文学化的叙事再现到影视化的艺术表达,长征作为一个持续被言说、被阐释的历史命题,已经形成了蔚为大观的“长征学”知识谱系。然而,在既有研究中,以图像为主导媒介、系统整合美术经典与文物影像来呈现长征全貌的著作,仍属凤毛麟角。《长征画传》的出版,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长征画传》这部著作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的“画册”——即文字附属于图像的图录式出版物,而是以画为经、以文为纬,图文互证、相得益彰的复合型史著。执行主编陈力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资深研究员,曾作为主讲人之一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讲授《红军长征胜利的回顾与思考》,其深厚的史学功底为本书的学术品质提供了基本保障。《长征画传》一书主体分为12章,以时间顺序为经、以空间转移为纬,编织出一幅完整的长征历史图景。从“风烟滚滚来天半”“战略转移去远方”的踏上征程,到“伟大转折正航向”“强渡嘉陵踏险途”的胜利进军;从“坚壁大志不移”“北上抗日勇当先”的曲折前进,到“硕果仅存在陕甘”“胜利到达吴起镇”的陕北落脚;再到“南下川康受挫折”“艰苦转战湘黔滇”的红二、红四方面军战况,直至“巩固发展大本营”“胜利会师开新局”的伟大胜利。这一结构设计体现了编著者清晰的历史意识:既要完整呈现长征从出发到会师的全过程,又要重点地凸显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翻越雪山草地、三军会师等关键节点;既要突出中央红军的主线叙事,又要兼顾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军二十五军的多线并进。这种多线并进的叙事结构,在长征史著中并不常见。《长征画传》在突出中央红军艰苦卓绝不屈不挠英勇长征的同时,在突出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的同时,也以应有的篇幅展示了红四方面军的披荆斩棘和率路蓝缕,诸如嘉陵江战役,甚至在张国焘一意孤行坚决南下的过程中,红四方面军顾全大局的浴血奋战,也都以一定笔墨予以呈现,关于红二方面军的负重披蓑,红六军团的排除万难,红二十五军的孤军闯险,均同样获得了充分展现。这种编纂策略,体现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论自觉——尊重历史事实,还原历史全貌,而不是以单一视角剪裁复杂历史。

“画传”这一体例的学术价值,在于它超越了传统史著的单一媒介局限。传统史书以文字为基本载体,图像在其中往往处于从属地位,或作为“插图”点缀其间,或被置于附录中作为“图版”供人查阅。《长征画传》则赋予了图像与文字同等重要的叙事地位——图像不再是文字的附庸,而是独立的历史叙事主体;文字也不再是图像的简单说明,而是与图像形成互文性对话的叙事伙伴。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观察,该书的图文关系可以概括为三种模式:其一,“以图证史”,即经典美术作品为文字叙述的历史提供具象化的视觉佐证;其二,“以图补史”,即某些文字难以尽述的历史细节(如武器装

感悟《红军长征史(典藏特装版)》的叙史特色

郝鹏飞

策贯彻执行”。讲科学性,关键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写作原则。例如,这部书对长征初期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予以如实记述,同时写道:在遵义会议上,“博古虽然是被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但他的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并没有借主持会议的权力去压制别人的意见”。对犯错误同志进行正反两方面评述,可以使读者感到真实可信。这种实事求是的原则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光辉,是党性与科学性有机统一的充分体现。

二、准确性与生动性的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胡乔木同志认为,党史著作“要写得让那些对党史没有多少兴趣的普通读者,读了也有所收获”。党史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史实准确是基本要求。2016年,将建农同志根据近20年来国内长征史研究的新成果,对少数史实及差错进行了订正,使得这部书更加严谨、准确,进一步提升了史学价值。

作为一部党史著作,生动的文笔能够感染读者,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具有更长远的普及性和影响力。在红军突破嘉陵江后,这部书引用了当地群众一首赞美红军胜利、嘲讽四川军阀失败民谣:“红军过了河,羊子奔索索,冬瓜遍地滚,猴子摸脑壳,矮子挨鞭打,刘湘怕活捉,请问委员长,看你又如何?!”这些对于人物和事件的刻画,似乎将读者送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给人一种身临其境之感。长征期间,战友之间感人至深的场面数不胜数。例如,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三在过草地期间为身体极度虚弱的周恩来抬担架;19年后杨立三去世,担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坚持要给他抬棺送葬。这种前后呼应的写法,将二人的深厚情谊刻画得淋漓尽致,读后让人泪目。再如,这部书写到陕甘支队翻越大盘山后,毛泽东感到“豁然开朗”,“柳暗花明又一村”,即兴赋词《清平乐·六盘山》。领袖诗词为书稿增添了文采,抒发了党中央、红军北上抗日的坚强意志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壮志豪情。

三、本然和所以然的统一

胡乔木同志曾经称赞《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我觉得,《红军长征史》这部书同样具备这个特点。首先,从“历史的本然”来看,这部书用了10章来记述红军长征全过程,如实记录长征过程、重要战斗、重要会

议、重要事件等,帮助读者了解长征的基本史实,对长征有一个完整全面的认识。

然而,只写这些是不够的,为了让读者更容易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还需要写清楚“历史的所以然”。这部书在叙述过程中对事件背景、决策过程、效果与影响等都作了交代。例如,在记述毛泽东作出关于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时,比较详细地作了三点解释:可以避免同优势的敌军决战;可以避强击弱争取主动;可以打乱敌军围歼计划。在记述娄山关战斗时,对娄山关的地理位置、地势特征作了详细记述,指出该地是遵义与桐梓两地的要冲、遵义北大门,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是兵家必争之地;中央红军如果不及时控制娄山关,下一步行动将受到极大限制。为了更加系统地总结“历史的所以然”,在结束语中对红军长征胜利的意义、影响、原因、经验及世界影响,作了较为系统和详尽的分析,充分体现了编著者对历史的科学思考与前瞻性分析。

四、史学价值与文献价值的统一

这部书根据叙史的需要,引用了相当数量的权威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史料,对历史叙事以有力支撑。据粗略统计,全书参考书目达到140多部,引用回忆史料或传记内容的地方达150处之多。例如,在记述红军战士翻越大雪山时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时,本书引用了萧锋《长征日记》的内容:“一路上,大家发扬团结互助精神,看到年纪大身体弱的同志就扶护。真是阶级感情深似海!”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所引用的史料和文献,大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大陆编辑出版的图书,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文献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台湾当局的史料。此外,还有国外人士的著作,如斯诺的《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等。在本书的最后,作者专门以《红军长征的世界影响》为题,系统梳理了外国对红军长征的记录和评价,属于一篇较为系统全面的学术综述。多角度、多领域的史料运用,可以产生相互印证、互为补充的良好效果,大大增加了本书史实的可信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此时此刻,广大党员干部如果能够读一读这部《红军长征史》,一定会收获感动、汲取正能量,这对于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长征路上团结奋斗,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编审)

以图像与文字双重叙事阐释长征精神

刘金祥

备、军服标识、地形地貌)通过图像获得直观呈现;其三,“以图释史”,即艺术作品中的情感表达与象征元素,帮助读者超越事实认知层面,进入对长征精神的感性体悟层面。三种模式相互交织,构成了多层次的历史认知通道。《长征画传》的图像采集工作体现了高度的系统性与专业性。该书收录了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国内权威机构收藏的众多著名画家的代表作,包括150幅经典美术作品、80件珍贵文物影像与70帧历史照片。这一图像谱系具有三重意义:一是来源权威,所有图像均来自国家级收藏机构,真伪可考、版本可靠;二是类型丰富,涵盖油画、国画、版画、雕塑、文物摄影、历史照片等多种视觉形式;三是时间跨度大,既有长征时期的原始影像,也有新中国成立后历代艺术家创作的长征题材经典,还有近年来新创作的作品。这种系统性的图像采集,使《长征画传》成为一座“可移动的长征艺术博物馆”。读者翻开书页,如同步入一个精心策展的展厅——沈尧伊的《遵义会议》、董希文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艾中信的《红军过雪山》、刘国枢的《飞夺泸定桥》等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悉数在列。这些作品本身已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与历史地位,将它们汇聚于一编,并以长征的时间序列加以组织,便产生了“1+1>2”的叙事效应——单幅作品讲述的是一个瞬间,串联起来便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值得深入分析的,是《长征画传》中的图像并非简单按时间顺序排列,而是经过精心选择与编排,形成了多维度的视觉叙事结构。第一维度是“战斗与行军”。湘江战役、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突破腊子口……每一场重要战役都有相应的美术作品加以呈现。这些作品多采用宏大叙事手法,以雄浑的笔触、浓烈的色彩、富有动感的构图,展现战争场景的激烈与红军将士的英勇。刘国枢的《飞夺泸定桥》中,红军战士在铁索上匍匐前进的身影,已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视觉记忆。第二维度是“苦难与牺牲”。如果说战斗场景展现的是英雄主义的壮美,那么雪山草地的描绘则更多呈现了苦难中的坚忍。董希文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以灰冷的色调呈现战士们在暴风雪中蹒跚前行的身影;张文源的《野菜》则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了战士们以野菜充饥的艰辛日常。这些作品共同回答了“长征何以如此艰苦”这一核心问题,也为读者理解“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境界提供了情感铺垫。第三维度是“团结与情谊”。彝海结盟的雕塑与画作、藏族同胞支援红军的文物照片、红军与沿途百姓互动的情景再现……这些图像共同构成了长征的另一面叙事——它不仅是军事意义上的战略转移,更是政治意义上的民心工程。正如书中所述,许多此前从未见过共产党人和红军的老百姓,正是通过这支队伍的行动与表现,第一次了解了他们的政治信仰与社会理想。

在学术评论中,有必要对《长征画传》中美术作品的运用进行方法论层面的反思。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美术作品作为历史呈现的媒介,其“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之间是何关系?显然,《长征画传》并非历史照片集——长征时期留下的原始影像资料极为有限,远不足以支撑一部“画传”的体量。因此,运用后世创作的美术作品来呈现长征,是必然的选择,也是合理的选择。关键在于,这些美术作品虽非“现场实录”,却并非“虚构”——它们是基于历史事实的艺术创作,是艺术家在深入研究史料基础上的想象性重构。沈尧伊为创作《遵义会议》曾多次赴贵州实地考察,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其对会场布局、人物神态、服饰细节的刻画均有史可征。从这个意义上说,优秀的历史题材美术作品,可以被视为一

种“经过艺术加工的历史证词”——它在事实层面忠实于历史,在情感层面贴近历史,在审美层面升华历史。《长征画传》的编纂者显然深谙此道。书中对每幅美术作品的作者、创作年代、收藏机构均予以明确标注,这种学术规范本身就传递了一个信号:这些图像是可以被查证、可以被讨论的“史料”,而非随意取用的“插图”。作为一部由权威机构主编、专业史家执笔的著作,《长征画传》在史实准确性方面经得起检验。全书对长征起因、经过、结果的叙述,与学界主流研究成果保持一致;对存在争议的史实细节,采取了审慎的处理方式。然而,《长征画传》并非一部仅供专业研究者阅读的学术专著。它的目标读者包括“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普通读者”。这就要求它在保持史实严谨的同时,必须具有可读性与感染力。编纂者的应对策略是:在宏观叙事框架中嵌入大量生动的历史细节与感人故事。微观叙事的引入,使宏大的历史进程变得可感可触。读者不仅“知道”长征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还能“感受”到长征路上一个个具体生命的喜怒哀乐。

除细节与故事外,《长征画传》还善用数据叙事来强化历史认知。书中系统呈现了四支红军队伍的行军里程、途经省份、战斗次数等关键数据: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纵横11省,行程2.5万里;红二十五军历时10个月,跨越4省,行程近万里;红四方面军历时1年半,转战4省,行程万余里;红二、红六军团历时近1年,纵横8省,行程约2万里。四支队伍总行程达6.5万里,共进行600余次重要战役战斗,跨上百条河流,翻越40余座崇山峻岭(其中20余座海拔4000米以上),穿过1.52万余平方公里的茫茫草地。这些数据本身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当读者得知“差不多每天就会进行一次战斗,每周都要跨过一条大河”时,对长征之艰苦卓绝的理解便从模糊的印象上升为清晰的认知。数据叙事与细节叙事相互补充,一个提供“量”的尺度,一个提供“质”的体认,共同构成了对长征的立体化呈现。

《长征画传》一书的最终旨归,并非仅仅让读者“知道”长征这段历史,更是让读者“体悟”长征精神、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长征画传》对长征精神的阐释并非空洞的说教,而是通过图像与文字的双重叙事来实现。当读者看到董希文笔下红军战士在风雪中跋涉的身影,读到“陈树湘断肠明志”的壮烈故事时,对“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理解便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有情感共鸣力的精神感召。这种“具身化”的精神传递方式,远比单纯的理论阐述更具感染力。

《长征画传》是一部在编纂体例、图像策略、叙事特征、价值功能等方面均有突出表现的长征史著。它以“画传”这一创新体例,突破了传统史书单一媒介叙事的局限,构建了图像与文本相互印证、相得益彰的复合型历史呈现方式。在图像运用上,系统汇集国内权威机构的经典美术作品、文物影像与历史照片,形成了具有视觉冲击力与历史真实感的图像谱系;在叙事策略上,兼顾宏观视野与微观细节,既完整呈现长征的全貌,又以生动的故事与数据打动人心;在价值取向上,将历史认知与精神传承有机统一,实现了“存史”与“育人”的双重功能。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长征画传》的出版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与教育价值。它不仅为专业研究者提供了图像史学研究的新材料,更为广大读者走近长征、理解长征、体悟长征精神提供了生动的读本。正如书中所言:“长征永远在路上。”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这段峥嵘岁月,《长征画传》以其独特的方式提醒我们,铭记历史,不是为了沉湎于过去,而是为了从那些用生命守护信仰的先辈身上,汲取继续前行的不竭力量。

(作者为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广西人民出版社新近推出的《写给青少年的长征故事》,以“让文物说话”为视角,从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的近千件长征文物中精选出24件,将宏大叙事转化为可触可感的长征故事。作为“青年大思政”书系的最新一种,该书延续了“用青少年听得懂、愿意听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的策划理念,读来令人印象深刻。

一、以物为媒,串起一部长征简史

翻开目录,读者看到的并非“第一章长征背景”“第二章湘江血战”等常规标题,而是一件件具体的文物:《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何叔衡送给林伯渠的毛衣、强渡乌江使用的棕绳、送给黎平向导的手提风雨灯、泸定桥的铁索链、高秀英过雪山穿的防滑钉鞋……乍看之下,这些物品彼此无关。毛衣是离别赠物,棕绳是渡江工具,钉鞋是登山装备。然而,顺着书页逐一阅读,会发现这些看似零散的文物,恰好对应着长征路上的一个个关键节点。从于都河畔到湘江血战,从遵义会议到四渡赤水,从彝海结盟到泸定桥头,从翻越夹金山到三军会师,24件文物如同24个路标,引导青少年读者一步步走完二万五千里征程。

这种叙事方式对青少年尤为友好。教科书上的概述容易随着考试结束而遗忘,但一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文物,会在青少年成长的某个时刻突然被想起。以强渡乌江的棕绳为例:书中不仅讲述了红军如何用棕绳捆扎竹筏、制作“水马”,还细致描写了乌江天险的地貌——两岸悬崖陡峭,江面宽二百余米,水流湍急,对岸有敌军机枪封锁。

青少年读者会自然地想象:那位在敌人火力下绑扎竹筏的战士,手是否也曾颤抖?而那盏送给向导的灯,则将“军民鱼水情”这一抽象概念,转化为一盏在黑夜里照路的灯、一份被普通人珍藏多年的信任。这便是“让文物说话”的力量。文物本身沉默如谜,但当叙事的光芒照亮其上,它们便从展柜中“站”了起来,替那些远去的人,重新开口说话。

不少青少年读者对长征的认知局限于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以为长征就是“从江西走到陕北”。事实上,长征是各路红军共同开展的战略转移行动。本书的一个可贵之处,在于其覆盖面全。书中不仅包含了最为人们熟知的中央红军故事,还专门选取了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的文物与事迹。读完这24个故事,青少年能够勾勒出一个清晰的长征认知图谱:为什么要长征?有几支队伍在走?各自经历了什么?最后在哪里会合?为什么是陕北?这些问题,书中均通过文物背后的故事给出了回答。它简明、完整、脉络清晰的故事线,使其不只是一本“故事集”,更是一部适合青少年阅读的“长征简史”。

二、以物入境,让青少年走进历史现场

面向青少年读者的历史读物,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使其进入历史现场。如果仅仅罗列时间、地点与意义,读者很容易失去兴趣;而如果能够让他们感受到“当时的人也是活生生的人”,历史便会焕发生机。

本书在“可感知”方面着墨颇多。每一件文物的讲述都不是冷冰冰的说明,而是还原为具有细节、画面与情感的现场场景。以湘江战役为例,书中并未简单陈述“战斗惨烈,红军损失惨重”,而是结合红军为抢渡湘江绘制的《灌兴全之间路线图》,详细描述了地图的绘制过程、部队的行进路线,以及湘江水被鲜血染红的惨烈景象。读者会不由自主地产生紧张感。

再以翻越雪山为例。书中介绍了高秀英的防滑钉鞋,钉鞋上的铁钉已经明显磨损,可见当时雪路之湿滑难行。书中补充了更多细节:许多战士没有钉鞋,只能用草绳绑在脚上;有人坐下休息便再也未能起身;有人在风雪中冻掉了手指和脚趾。这些叙述并不煽情,却足够真实,足以让今天的青少年真切感受到雪山的严寒与残酷。

书中还专门设置了“青春感想”板块,鼓励读者在读完每个故事后写下自己的感受。这一设计意图明确:不将青少年视为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而是希望他们与历史展开对话。正如序言中所言:“愿这本书中的每一件文物、每一个故事,都能成为青少年青春记忆中的‘束光’。”这种沉浸式阅读体验,恰恰是当下青少年最需要的。在这个时代,他们并不缺乏了解红军长征的渠道,缺乏的是与那段历史建立情感联结的入口。而这24件文物,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入口。

三、以物见志,让革命理想不再遥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信念的胜利。”对于今天的青少年而言,“革命理想”“长征精神”倘若只留在试卷的填空题里,终究是几个飘着的词。但当它们与具体的文物、具体的人联系在一起时,便拉近了与宏大历史叙事、崇高革命理想之间的距离。

何叔衡送给林伯渠的那件毛衣,是长征出发前赠予的。当时两人都清楚,留在苏区意味着九死一生。何叔衡最终牺牲,那件毛衣成为永别的信物。青少年读者从中可以看到:所谓“信仰”,并非口头上的宣誓,而是在明知可能无法生还的情况下,仍然选择留下。

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是另一件令人久久难以平静的文物。他戴着镣铐,用敌人让他写“悔过书”的纸笔,写下了对未来的憧憬:“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新,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建设……”他没有看到这一天,但他的文字留存下来。青少年读完这个故事,更能理解什么叫“视死如归”。那是不畏牺牲死亡、而是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

还有陈毅亲自誊写并修改的《游击战争纪实》手稿。当时他被困在赣粤边区,靠野菜野果充饥,身上长满疥疮,却仍在修改诗稿、记录战斗。书中有言:“即使食不果腹、险象环生,因为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仍能保持乐观豁达的豪情。”这些文物与故事,使伟大长征精神不再是教科书上需要背诵的段落,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在绝境中做出的选择。青少年读者会从书中看到:那些了不起的人,同样会害怕、会犹豫、会思念家乡,但他们最终选择了坚持。这种“选择”的力量,比任何说教都更能打动年轻的心灵。

90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走完了长征。他们并未想到会被后人反复书写,只是在每一个关口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今天,新时代的青少年也走在属于自己的长征路上:或许是学业的压力,或许是成长的迷茫,或许是未来要承担的责任。这本《写给青少年的长征故事》没有给出简单的答案,但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当你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回想那根棕绳、那盏马灯、那双钉鞋,回想那些朝气蓬勃、革命乐观的青年人,他们曾经走过比我们艰难千百倍的路。

历史从不遥远,它只是等待一个被重新听见的方式。当棕绳、毛衣和钉鞋从纸上走进青少年的心中,长征便不再是一段要背诵的历史,而是一束可以照进青春的光。

在文物里触摸长征,在故事中读懂信仰

张玉栋